

都市文化视野下的民国上海茶室

徐 蕾¹, 包树芳²

(1.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2.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00)

摘 要: 上海茶室有着独特、丰富的内涵,它的兴衰是上海一个时期的缩影。在经营和管理上适应了时代和都市发展的需求,它是文人集中地,产生“文艺沙龙”现象的重要场所,在特殊时期它的形象曾被建构。上海茶室承载着时代和城市的印记,交织着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影像,是考察都市文化及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独特窗口。

关键词: 上海茶室; 都市文化; 文艺沙龙; 形象建构

中图分类号: TS 97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730(2018)02-0009-04

上世纪 20 年代之后,上海逐步迈向国际化大都市,民众的休闲娱乐日益多元,上海茶室应运而生,至“孤岛”时期兴盛一时,之后茶室日渐式微。上海茶室在经营管理和消费文化上彰显出都市文化的鲜明特征,文人在茶室的群集以及“文艺沙龙”的出现则是上海文化发达的一个侧影。由于兴盛于特殊时期,在时人复杂的言论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被建构的茶室形象。目前学界对茶馆有了一定的研究,但民国时期上海茶室却少有人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几方面的论述,展示上海茶室的真实面貌及其蕴含的丰富内涵。

1 上海茶室的兴衰历程

上海茶室的诞生与广东茶馆有着一定的联系。晚清时期广东茶馆就已入驻上海,并以其精良装修与美味点心赢得沪人的一致好评,所谓“专供过客息游踪,茶馆精良算广东。既使相如疗渴疾,点心又可把饥充。”^[1]晚清时期,全安、同安、易安、同芳居、怡珍等广东茶馆在上海独具风味,沪人也多乐意往之。民国后,粤商又在广东人较为集中的虹口区开设酒楼,而酒楼一般都附设茶馆。20 世纪 20 年代虹口区的广东茶馆主要有小壶天、会元、粤南、广东楼、安乐园、西湖楼等。这些广东茶馆已经有了茶室的雏形。

茶室的正式诞生一般以 1927 年新雅茶室开张为标志。该年新雅打出广告“新雅商店,海味罐头,送礼品物。新雅茶室,日夜茗茶,点心面食。”^[2]“茶室”名称最初即出现在新雅的广告中,这也是以新雅为茶室渊源的原因。从广告中看出,新雅最初是食品商店与茶室的结合。1932 年新雅主人在南京东路开设了新雅粤菜馆,仍附设茶室。新雅茶室虽早就开张,且生意不错,但是直到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之后随着茶室的普遍开设,茶室之名才逐渐传开。1937 年 3 月一位老茶客谈到“提起这茶室,也就是近年来所发现的新名词……在目下,南京路上,新雅酒楼的茶室是首屈一指,大东茶室附着永安公司的特殊名贵,也大做其卖茶生意,因为此道大有图利可能,接着冠生园、大新公司以及国货公司等,乘时崛起,茶风遍上海,吃茶同志陡然增加十倍。”^[3]

“孤岛”时期上海茶室兴盛一时。时人称:“茶室在‘八一三’后,要算是最蓬勃的了,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有新的茶室。”^[4]1939 年费西畴编著的《上海新指南》中详细列出了当时 29 家著名茶室,主要集中在南京路、静安寺路、霞飞路等商业繁华地段,当时的一些大公司、酒楼如永安、先施、大新以及新雅、冠生园、锦江等大多附设茶室。除了这些著名茶室,还有众多小茶室。当时各茶室

收稿日期:2018-04-02

作者简介:徐 蕾(1979-),女,江苏苏州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中国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副研究员,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城市社会生活研究;

包树芳(1978-),女,江苏常州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城市史研究。

生意相当兴隆。“一般的茶室,的确从早晨一直至晚上打烊为止,没有一分钟不是宾客满座的。如果再逢上个礼拜日或者什么假期,每一家茶室就更显得拥挤了。”^[5]

不过上海茶室的黄金时期很短。1940年代末,政府在统计上海茶室数量时,发现仅有5家。各类报纸上有关茶室的文章也是少而又少。

考察上海茶室的兴衰历程,可以发现孤岛时期是上海茶室的兴盛期,可谓其兴也勃、其衰也忽。为什么上海茶室在孤岛时期会如此兴盛?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四年时间是上海孤岛时期。此时上海周边被日军占领,唯租界孤傲而立,其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租界既是避难所,又是生产投资的理想之地。大量外地人口涌入租界,刺激了租界消费市场的繁荣。各地政客、富商带来了充裕的游资。据统计,至1941年6月,游资达到30亿元。^[6]各种因素的融合,使得上海租界工商业在孤岛时期兴盛一时,而这种兴盛是短暂的、投机的、不合理的,因此被称为“畸形繁荣”。随着上海国际化、都市化进程的推进,休闲娱乐愈趋多元化,饮食消费日趋高档化、舒适化。茶室凭借现代化的经营和管理,脱颖而出,成为一处新型的、满足孤岛时期民众需求的休闲场所。孤岛时期上海还出现了一些完全西化的音乐茶室,如立德尔茶室、可乐花茶室、大富贵茶室等,不光取名充满西洋色彩,也多伴有唱歌和跳舞。这些茶室与新雅、大东等正规茶室的旨趣相去较远,这是上海茶室在孤岛时期畸形繁荣下的一种特殊类型。孤岛时期上海茶室的兴盛得益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一旦脱离这种时空背景,繁华不再也就很自然了。

2 上海茶室区别于传统茶馆的都市化特征

上海茶室不同于传统茶馆,它是在传统茶馆基础上提升之后融入更多西方元素、更为适应都市文化的一处休闲场所。

2.1 布置幽雅、设备精致

茶室褪去了传统茶馆的陈旧色彩,厅堂宽阔,圆桌(或方桌)和火车座兼备,且设备考究、装饰精良。著名的大东茶室是长方形的屋子,白色壁、白色顶、白色灯球,靠阳台悬着草绿色的窗幔,屋子里有百余张小方桌,小方桌的布毯有米色的、橙

黄色的、天蓝色的,也有跟窗幔一样的草绿色,布置优雅、干净。^[7]即使小茶室也是设备精致、充满格调。如当时的一家小茶室——华安茶室内部划分十个小房间,宛如旅馆,室小而雅,环境清静,壁上按有电灯,横列桌一张,两边有茶几,每室可容纳四五人。^[8]这样的环境,加上冬有水汀电炉、夏有风扇冷气,自然吸引了一批有闲、有钱阶级。^[9]上海茶室在建筑、装修、设备等方面都是传统茶馆无法比及的。

2.2 食品多样、风味独特

晚清时期,广东茶馆的点心独具风味,“清晨鱼生粥,晌午蒸熟粉面各色佳点,入夜莲子羹、杏仁酪”^[10]。上海茶室仍然提供点心,此外,各茶室还提供各类面食、佳肴。新雅茶室的咖喱鸡特别有名,是用真印度咖喱粉,还加椰汁和奶油。“马浪路霞飞路京城茶室……近增设各种素食。并添设冷饮部,备有各式清冷食品,如冷面凉粉、绿豆汤、百合汤之类,清洁卫生。虞洽卿路汕头路口金城中西菜社,为唯一京苏粤菜,烹调可口,尤其是茶室面点,清洁卫生,有独到之处。”^[11]正所谓“叉烧包、鸡肉包、伊府面以及牛奶、土司、咖啡等名目,真是多得不可胜数,致任何人见了,均不免要垂涎三尺”^[12]。可见,茶室并不以售茶为主,点心、食品的多样和精致才是茶室吸引客人的“杀手锏”。茶室既提供了类似茶馆那种轻松、开放、自由的环境,客人可以在喝茶、吃点心过程中聊天、交友、办事,同时茶室还提供各类美味、新奇食物,客人随时可以饱餐一顿。因此上海茶室可以说是茶馆为主、饭店为辅的结合体。

2.3 管理先进、服务周到

上海茶室点心的供应方式较为特别:各种广式甜咸点心装在瓷盆里,由服务员用车子推送到桌边来,听任客人选取……伙计们眼看四方,耳听八方,身手敏捷,从未见有怠客现象。^[13]在服务员雇用中,女招待已较为常见。茶室中的女招待被称为“茶花女”^[14]。博采众长、中西合璧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使得茶室绽放异彩,成为一处新型的公共场所。

3 文人与茶室

上海茶室吸引了大量的文艺界人士、学生、洋行及公司职员、电影明星等。1927年新雅茶室开张不久,就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关注。漫画家季

小波回忆,由于这茶馆地段安静,尤其是餐具消毒卫生可靠,吸引了如傅彦长、朱维纪、张若谷、黄震遥、戴望舒、刘呐鸥、邵洵美、叶灵凤等文艺界名人。被季小波认为第一个发现新雅的是文人林徽音,年轻诗人徐迟经施蛰存的介绍常去新开的新雅茶室,此室还专门设有“静山茶座”,每天下午2点至5点成为沪上摄影家们聚会的场合。不少文艺界人士几乎每天必到,风雨无阻。因此季小波说“新雅”是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15]

南京路上的大东茶室,也是文人会聚之地。据萧乾回忆,1936年赴上海编《大公报·文艺》时,他与巴金、黎烈文、章靳以、黄源、孟十还等人经常聚集于大东茶室,以至于当他1939年离开上海时,大东茶室成为他“值得怀念的一个角落”^[16]。大东茶室的文人相聚,对萧乾来说还有着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在聚会上受到巴金的指点。“在当时文艺界那复杂的局面下我没惹出什么乱子,还多亏巴金这位忠厚兄长的指点。”^[16]编辑赵家璧也有相似的回忆:上海文艺期刊的朋友约定每一个星期几的下午,一起去大东茶室饮茶聊天,亦称之为文艺沙龙式的聚会。^[17]除此两家,南京路上的大陆商场茶室也是文人经常光临之地。

文人的集中,引来了众多报纸杂志的编辑。文人写稿、编辑取稿,有些茶室逐渐成为“文章交易场所”。有人回忆抗战以前大东茶室的“交易”场景:“当时私人营业性的报刊杂志极多,如果需要稿件,可在茶室约稿或购稿,急需者当场可取。有些文人,避免家中烦杂,就利用茶室作为写作场所,服务员照样热情招待,并不弹眼惹厌。从早茶开始直到吃过夜饭……茶室,无异是文艺写作者的交易场所。”^[18]“文艺市场”还算是雅号,有人直接称其为“卖稿市场”,到1948年,周刊逐渐停刊,粗俗的“卖稿市场”随之停止。^[19]

上海文人在茶室的汇聚,是上海文化发达的一个侧影。而由于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所以文人们的文化活动也不免沾染上商业色彩。

4 孤岛时期茶室的形象建构

前文说及,上海茶室兴盛于孤岛时期。可是茶室这一时期的如火如荼正是全民抗战、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的时期,人们极易把茶室与孤岛时期的畸形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茶室的迅速“蔓延”,时人对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一是茶室里的“清谈”及休闲文化,二是茶室里的“茶花女”。透过当时各类小报上连篇累牍的言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被建构的茶室形象。

4.1 救亡中的茶室休闲

抗战前,有人就作文讽刺挖苦茶室里茶客的清谈“何况以清谈而误国,以至亡国,总比秦桧吴三桂之流的卖国,要风雅得多了!”^[20]在激愤的言论中,作者把“清谈误国”的罪名扣在了茶客的头上。随着“八一三”抗战以后茶室的蓬勃兴起,这类言论日益增多。很多文章都认为茶室是有闲阶级的乐园,是无聊者的聚集地。一边是一杯清茶,几盘糕点,悠悠度过了无聊的光阴,另一边却是无以果腹、啼饥号寒的灾民,这也反映了上海孤岛时期的畸形繁荣。时人认为,上海小市民并非不关注时事,把茶室当作“精神的遁逃藪”。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小市民进茶室喝的是一杯“苦茶”!

在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下,茶室的高堂满座,茶客的“清谈”“喝苦茶”都是不合时宜的,因此针对茶室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负面内容为主。当消费文化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民族、国家至上是不容置疑的,所以对茶室指责、批评的现象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这些充满指责、批评的文章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孤岛时期茶室的“高堂满座”和茶客休闲的多样场景。抛开“救亡”“爱国”的话语,这就是一种真实存在!

4.2 有色眼镜下的茶花女

茶花女源自大东茶室,“从大东茶室创办以来,茶室中好像必须要备女招待”^[21]。到孤岛时期,茶室雇用女招待已经较为普遍。作为女子职业的一种,当时茶花女广受关注的是她们的容貌,品评茶花女的文字充斥当时的报纸杂志。有人对大东、国货公司饮食部、冠生园三家茶室的茶花女分别进行了点评。点评的重点是茶花女们的姿色,诸如身材、面容、肤色等,关注的是她们美丽与否。至于工作表现以是否受到茶客欢迎为标准,对其不满意则任意取绰号。茶花女服务亲切又周到,因此有“醉翁之意”的茶客并不少。大东茶室生意兴隆与茶花女密切相关,“里面女侍的衣服清洁雅静,容貌都很不错。为着这一特点,颇引起了些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茶客,每日风雨无阻,必要到驾一次”^[4]。有人提到大东茶室的一位“水果西施”(推水果车的茶花女),“她像法国花园推摇篮

车的西洋美人,一步一回眸,向涎着脸的色情茶客,用秋波媚眼来兜销果品……”^[22]这里既有“涎着脸的色情茶客”,又有“秋波媚眼”的茶花女。

时人的复杂言论让我们看到了当时茶花女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职业困境。在她们周围,是一群以貌取人、戴着有色眼镜的男性茶客,其中不乏找乐子的“色狼”茶客。因此她们是“花瓶”,她们是“活动商标”,她们是“茶室的生命线”!确实也有茶花女卖弄风情,但可以试想,如果茶花女利用色相招引茶客在新雅等茶室中是普遍现象,那么小报早已对此大肆渲染,而不会如此风平浪静了。因此这种对茶花女的消费是“孤岛”时期上海茶室畸形繁荣背后消极、颓废文化的体现。“茶花女”是有闲阶级的关注对象,是困惑于时局的愁闷者的无聊寄托。

上海茶室虽然兴盛时期并不长,但它经营独特、内涵丰富,是考察都市文化及社会变迁的独特窗口,为后人了解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都市文化提供了鲜活的资料。

参考文献:

- [1] 顾炳权. 上海洋场竹枝词[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6: 290.
- [2] 新雅茶室[N]. 洋泾浜, 1927-12-04.
- [3] 陈忠豪. 茶室风光[J]. 小姐, 1937(6): 33-34.
- [4] 易人. 茶室[J]. 上海生活, 1938 2(1): 17.
- [5] 新良. 有闲阶级的乐园——茶室[N]. 文汇报, 1939-04-22.
- [6] 潘君祥 王仰清. 上海通史: 第8卷 民国经济[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62.
- [7] 大东茶室小景[N]. 申报, 1936-08-31(4).
- [8] 应东. 小茶室的风趣[N]. 新民晚报, 1947-02-14.
- [9] 往有冷气的地方去[N]. 社会日报, 1938-07-17.
- [10] 葛元煦. 沪游杂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31-32.
- [11] 市场短讯[N]. 文汇报, 1938-06-17.
- [12] 上海人的吃食[N]. 申报, 1939-01-17(17).
- [13] 里里. 我孵过大东茶室[N]. 新民晚报, 1988-05-21.
- [14] 丁大元. “大东茶花女”考[N]. 社会日报, 1936-06-17.
- [15] 萧乾. 海上春秋[M]. 上海: 上海书店, 1992: 83-84.
- [16] 萧乾. 人生百味[M]. 北京: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99: 378.
- [17] 赵家璧. 文坛故旧录: 编辑忆旧续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48.
- [18] 顾国华. 文坛杂忆初编[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112.
- [19] 李果. 海上文苑散忆[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96.
- [20] 灵犀. 吃茶篇: 下[N]. 社会日报, 1936-06-06(2).
- [21] 茶室女招待[N]. 社会日报, 1936-07-23(4).
- [22] 茶室风光[N]. 社会日报, 1939-05-23.

Shanghai teahouse in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version of urban culture

XU Lei¹, BAO Shufang²

(1.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Shanghai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Shanghai, 200000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teahouse had a unique and rich connotation. Its rise and fall was the epitome of a period in Shanghai,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in terms of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It was an important place where literati getting together and salon phenomenon produced. Its image was once constructed in a special period. Shanghai teahouse carried the mark of times and the city, intertwined with the image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which made it a unique window to examine urban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Shanghai teahouse; urban culture; cultural salon; image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王芙蓉)